信念与经济增长
——基于全球价值观调查的跨国证据

姜树广 孙 涛*

摘要 本文关注信念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使用全球价值观调查涉及的信任、社会正义信念、竞争信念和工作—休闲信念构造的综合信念健康度指数显著解释了过去二十多年全球经济增长的国别绩效差异。信念通过影响个人的行为动机作用于社会,并以群体意志的形式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和政策产生影响。信念在不同国家表现出极大的差异,并随时间发生变迁,这有助于解释增长的国别差异和跨时差异。本文还发现,中国具有极高的综合信念健康度,较好诠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关键词 信念 经济增长 全球价值观调查

一、引 言

对经济增长根本原因的探讨是经济学领域最激动人心的话题之一。然而,不管是将人均收入的差异解释为要素积累不同路径的传统新古典增长理论(Solow,1956;Cass,1965;Koopmans,1965),还是引进了技术创新、专业化分工和人力资本的内生新增长模型(Romer,1986,1990;Lucas,1988;Grossman and Helpman,1991;Aghion and Howitt,1992)都没能提供一个既能解释长期的经济增长,又能解释增长国别差异的根本答案。随后,出现大量文献从不同角度探讨经济增长背后的根本因素,如法律起源(Glaeser and Shleifer,2002;La Porta *et al.*,2008)、制度质量(Hall and Jones,1999;Acemoglu *et al.*,2001,2002;Glaeser *et al.*,2004)或地理因素(Sachs,2003)等。

另有一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根本解释强调文化的重要作用(Granato *et al.*,1996;Guiso *et al.*,2006;Tabellini,2008,2010;Algan and Cahuc,2010),一个自然的解释是具有不同种族的国家拥有不同的文化,文化是决定个人和一个社会的价值、偏好、信念的关键因素,而这些差异在决定经济表现中扮演着关键角色(Acemoglu *et al.*,2005)。然而,文化是一个宽泛而无精确定义(大而无当)的概念,同一文化中可能同时包含对经济积极和消极的因素。事实上,大量研究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文献都以只包含一两个关键成分对文化进行狭义的处理,譬如 Granato *et al.*(1996)主要考察了成就动机,La Porta *et al.*(1997)和Knack and Keefer(1997)开创性的研究只聚焦于信任这一单一

* 姜树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深圳证券交易所博士后科研工作站,E-mail:jsg123000@sina.com;孙涛(通讯作者),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E-mail:tao_sun@sdu.edu.cn。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1CJL016)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责自负。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信念，Barro and McCleary(2003)则关注相信地狱和天堂的宗教信念对增长的作用。

信念与文化具有极为紧密的关系而又并非同一层面的事物。文化一定程度上是一定群体成员共享的信念体系，而文化背景又塑造成员的信念。社会群体中成员持有的主导信念可能是构成包括制度变革、生产创造、市场贸易等的根本动力。Weber(1930)认为，西欧工业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特别是加尔文教派兴起的新教改革，其中的关键在于新教教义本质内涵所包括的一套对世界的信念，这是促成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Greif(1994)认为，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对人类行为合宜性的信念，如一些信念主张执行惩罚策略而另一些则不主张，这可以改变既定制度环境中的均衡结果。Landes(1999)也认为，西方世界的崛起源于特定的一系列关于世界以及人类行为会如何改变世界的信念。有理由相信，一定国家或地区人口群体所持有的主流信念是决定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微观的个体决策到宏观的经济表现，信念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人类看待世界的一系列观念中，对待工作、竞争、信任以及社会分配正义性的信念直接关系到一个经济体从微观个体的激励到宏观政策目标的实现。这些信念呈现出显著的国别差异，并且随时间推移发展变化，构成经济增长绩效国别和跨时差异的重要原因。为支持这一论断，本文延续文化经济学领域文献如 Barro and McCleary(2003)和 Algan and Cahuc(2010)等的研究思路，并没有在传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扩展建模，而是在理论上采取文献证明的方式，以大量已发表的相关文献论证这些信念如何与个体激励以及宏观绩效相关联。进一步的，从全球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的数据中选取出四个对经济绩效具有重要意义的信念变量，包括信任、社会正义信念、竞争信念和工作—休闲信念，并且以这四个变量构造的信念健康度指数度量不同国家在经济相关信念中的差异。实证分析表明，信念健康度指数是过去 20 多年间决定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这也为丰富多彩的增长与发展理论增添了新的解释视角。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中国增长奇迹的解释中，强调要素结构、制度变革等因素的作用，而很少提及作为创造主体的个人其价值信念扮演的作用。我们对全球价值观的数据分析表明，在调查覆盖的 87 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信任水平位居世界第四，仅次于芬兰、瑞典和丹麦①。另外，超过 72% 的中国受访者倾向于认为更努力工作会带来更美好的人生，认为工作比休闲重要的人是认为休闲比工作重要人数的六倍多(美国是两倍)。在针对儿童培养的调查中，77% 的中国人认为努力工作是需要培养的良好品质(美国这一比例为 58%)。另外，81.5% 的中国受访者认为工作是对社会的责任(美国的情形是 56.7%)②。在 Alesina *et al.* (2001)的对比分析中认为美国比欧洲具有更好的信念基础，我们通过对比发现在本文关注的各项指标中国都显著优于美国，并且构建的综合信念健康度指数中国位列世界第二。中国人更加信任对方，更加重视工作和竞争，更加相信努力工作会带来人生成功，这是构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动力来源之一。

① 在针对信任的信念回应中，54.2% 的中国人认为大部分人值得信任，日本的这一数字是 41.6%，美国是 37.2%，印度是 34.6%。

② 另外，57% 的中国受访者认为成为一个富裕的人对自己很重要，而美国这一比例不足 38%；约 77.6% 的中国受访者表示获得成功和别人对自身成就的认可很重要，美国的这一比例约是 67.6%。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二、信念与经济绩效:传导路径

信念是一个谱系很广的概念,在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尽相同。根据Aoki(2011)对经济学中信念的分类,本文关注的信念主要是"文化信念"和"价值或道德信念",前者是指特定群体成员共有的观念或思想,而后者是指人们认为正当合理的、坚信正确的观念认识。信念根植于每个人的内心,强化于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基因之中。尽管每个人都持有完全不同的人生信念和对世界的根本看法,但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在整体上会呈现出某种一致性的趋势,整体的平均信念水平在国别之间存在差异。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表明各种信念程度的国别差异明显,即使在具有较高一体化程度的西欧国家内部也存在巨大的信念差别(Suhrcke,2001)。

要解释为什么会存在如此显著的信念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如何导致经济绩效的不同,必须面对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信念是如何而来的?二是信念是否随时间发生变化?信念的来源与变迁问题也是理解信念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核心。关于信念的来源问题,Bisin and Verdier(2001),Bisin *et al.*(2004),Guiso *et al.*(2008)和Tabellini(2008)等的研究中主要强调了两个主要来源:一是个体生存当代的社会环境,二是继承自祖先的信念。后者即强调文化的影响力,认为信念具有稳固的成分,但是以此来解释增长就无法处理增长的跨时差异,比如怎样解释中国从低增长国家进入高增长国家的行列。固有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信念也会随着接受的教育以及个人面对现实社会的心理体验的改变而改变,更会由重大社会变革引起整体的变迁,如Alesina and Fuchs-Schündeln(2007)通过对东西德国的比较分析显示社会主义深远地改变了很大比例人口的信念。Di Tella *et al.*(2007)由自然实验证实产权可以导致人们的信念变化,另外,Di Tella *et al.*(2012)发现在对私有化负面态度盛行的背景下,私有企业对供水系统投资的现实改变了人们对私有化的信念。这些研究同时也表明信念与经济结果之间可能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信念差异带来经济绩效的不同,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塑造人们的信念。

理论上讲,信念可以通过多个渠道对经济结果产生影响。其一,信念通过作用于个人的动机影响经济表现,信任他人的个体更倾向于参与合作生产和市场交易,相信社会正义的人会对自己和子女进行教育投资,努力工作以实现人生成功,认为竞争重要的人会不断激励自我进行创新和提升,而相信工作比休闲重要的人自然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生产创造环节。对于这一影响渠道,在本文第四部分我们将针对个人收入与个人信念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其二,信念通过影响合作效率产生经济效应,容易理解在一个普遍持有积极信念的社会中合作与市场贸易都更加容易实现。其三,信念通过影响根本制度的形成和变革而对经济产生影响。大量的研究工作将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因指向制度,将经济绩效的不同差异解释为各国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Acemoglu *et al.*, 2005)。而在著名制度经济学家对制度的定义中,都不同程度将制度定义为"共享信念"的系统(Aoki,2011;Denzau and North,1994;Greif,1994),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对经济的影响本质上是群体信念的影响。其四,信念通过作用于公共政策从而影响经济,如社会正义信念可以通过影响不同社会的再分配政策导致经济绩效的差异(Alesina and An-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geletos,2005)。另外,一个社会对政府在经济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的认知、产权的安排、司法制度等都由群体信念所决策,如 Di Tella and Dubra(2008)论证以美国梦为特征的信念系统不仅包括对社会正义的信念,还涉及对惩罚作用的认识,信念通过影响惩罚制度作用于经济结果。接下来我们针对本文关注的四种主要信念的经济意义分别进行论述。

(一) 信任

本文关注的信任是指信任信念,以区别于社会资本和文化等概念。Gambetta(2000)直接将信任定义为一种信念,即可以用概率来度量,"当我们说信任某个人或某个人值得信任,暗含的意思是这个人将会做出对我们有益的行动的概率足够高以使我们考虑参与同其的一些形式的合作"。已有大量文献对这种信任信念的决定因素及其与经济绩效关系进行了考察,Arrow(1972)指出"全世界大部分的经济失败可以解释为缺乏相互信任",这一观点得到 Coleman(1990)、Greif(1993)和 Putnam(2000)等研究的不断诠释。La Porta *et al.*(1997),Knack and Keefer(1997)以及 Tabellini(2010)等使用全球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实证发现信任与国家之间经济绩效存在相关性,但是,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信任与经济增长的交互因果关系如何界定。Algan and Vahuc(2010)使用美国移民继承先辈的信任成分作为工具变量对信任与增长的因果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继承的信任可以解释 1935—2000 年间经济发展水平国别差异的绝大部分,并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落后的绝大部分可以由低的信任水平得到解释。

(二) 社会正义信念

人们需要相信他们生存在一个正义的世界,一个人们普遍能够得到他们应得的东西的世界(Lerner,1982)。人们需要不断地激励自己(或子女)去努力工作,进行教育投资,在逆境中不屈不挠,以及避免陷入懒惰、福利依赖和沉溺于毒品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维持每个人会最终获得他们的"应得"(just desserts)的乐观信念就极为可贵(Benabou and Tirole,2006)。尽管人类拥有同样的正义信念需求,但是调查显示对待社会正义的信念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具有重大的差异(见表 1)①。这种国别之间社会正义信念的差异对各国经济政策以及最终经济绩效的实现都产生重要影响。

Alesina *et al.*(2001)实证分析表明,一国的社会福利支出与持有运气和关系决定收入的信念之间显著正相关。一个典型的现象是同为发达经济的美国和欧洲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从公共政策到经济绩效都呈现出显著差异。"美国梦"以普遍相信努力工作带来美好生活为特征,表现为自由放任的公共政策,而欧洲则对社会正义持悲观态度并推行

① 根据 Benabou and Tirole(2006),关于人们对运气与努力在人生中角色持有不同信念的原因有三派理论:一是 Piketty(1995)提出的学习成本问题,由于不能了解真实的社会流动性需要用不同程度的努力去实验,人们最终会停下来而停留在一种纯粹无意识的、偶然的错误信念;二是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认为受掌握教育、媒体资源的资本家的教育所洗脑,工人持有对市场回报公平性和努力改变命运前景的错误意识,Alesina and Glaesr(2004)认为思想灌输主要为富裕阶层控制,而欧洲主要为被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工会、教师和政治家影响;三是认为个人信念由个人的功能目的和心理需求以及真实数据而塑造,一定程度上,人们相信他们想相信的东西。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高福利政策。虽具有类似的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美国的经济绩效显著优于欧洲。Alesina and Angeletos(2005),Benabou and Tirole(2006)等认为美国社会相信个人努力决定收入,倾向于选择较低的收入再分配水平和低税率,均衡状态下努力水平高而运气扮演的成分有限,从而市场结果会相对公平,社会信念进一步得以自我实现;欧洲社会更相信运气、出身、关系、腐败等决定财富,倾向选择高税率制度,从而扭曲分配关系,这种信念也能进一步得以维持和固化。另外,Hirschman and Rothschild(1973),Piketty(1995,1998),Benabou and Ok(2001),Rotemberg(2002)均对社会正义信念在社会分配等政策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模型分析。Alesina *et al.*(2012)的研究表明当考虑公平信念的不同时,可以理解为什么两个在其他方面相同的国家保持长期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三)竞争信念

竞争对经济的重要性无需多言,整个经济学的基础都是以竞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亚当·斯密(Smith,1776)认为,竞争是市场的本质特征,是创造价值的首要机制。从生物演化的角度看,优胜劣汰的机制是演化的基本动力,竞争常常能够促进生存和成功(Axelrod,1984)。在个体层面,高竞争性的个体更愿意承担风险,付出更高的努力以获取人生成功,如以食指—无名指长度比度量的竞争性,Manning and Taylor(2001)和Honekopp *et al.*(2006)发现其与运动员在体育比赛中取得的成绩显著相关,Coates *et al.*(2009)则发现其与金融交易员的收益也存在显著关系。Charness *et al.*(2010)的实验发现参与者对相对地位的追求会增强努力工作的动机,而竞争性的偏好是根本的机制。

在宏观层面,人们对待社会竞争的信念直接关系到社会竞争的实现。亚当·斯密(Smith,1776)认为,人们应该拥有公平的机会竞争生产、销售和购买产品与服务的信念是经济成功的关键。Furnham *et al.*(1994)对41个国家青年竞争信念的调查表明,竞争的信念与人均GDP和过去10年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相关性。Duman(2013)认为,关于社会竞争的信念会影响对社会再分配的需求和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

(四)工作—休闲信念

毫无疑问,一个社会的财富是由劳动创造的,社会的劳动投入与财富增长紧密相连。Benhabib and Perli(1994)和Ladrón-de-Guevara *et al.*(1999)等扩展的增长模型中都包含了休闲的作用,Gómez(2008)在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中引入了休闲和休闲的外部性来分析对长期增长路径的影响。在对美国与欧洲经济绩效差异的解释中,许多学者也强调了两者在工作时间上的巨大差异(Prescott,2004;Alesina *et al.*,2006)。Azariadis *et al.*(2013)发现休闲偏好的微小差异可以导致工作时间和经济增长的巨大不同,认为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欧美在发展路径方面的差异。Prescott(2004)等从税收等不同角度解释了工作—休闲时间的差异,另一个显而易见的途径直接来自人们的信念差异。在其他激励等同的情况下,如果一种文化信念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劳动创造,则这种信念将驱使人们投入更多的时间到劳动创造之中。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中包含着对待工作与休闲的不同认识,不过,随着社会财富的变化这个认识也在发生变化,综合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效应反映到实际的工作投入上,从而带来增长绩效的差异。

三、变量选取与数据描述

本部分使用全球价值观的数据实证研究信念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全球价值观调查是一项大型的跨国调查,关注人们的价值观和主观信念,目前已完成的五轮调查时间段分别是 1981—1984 年,1990—1993 年, 1995—1997 年,1999—2004 年和 2005—2007 年。每轮调查的覆盖范围不尽相同,调查的问题涉及不同类型的态度、信仰、偏好等主观信念以及基本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等)。我们在调查问卷中主要选取了四个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指标,涉及对他人的信任信念、对社会正义的信念、竞争信念和工作—休闲信念。之所以选取这四个变量,一是因为这四种信念是目前经济学文献已深入研究并表明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二是因为这四种信念在国际范围内具有共性特征,而如宗教信念或政治信念等则具有较多的文化特殊性。

关于信任信念(对应问卷 A165)的问题是:通常来说,你认为大部分人是可以被信任的还是认为需要对人们保持警惕? 1—大部分人可以被信任,2—需要特别警惕。本文在使用数据中进行了处理,将选择信任的值设为 1,而原来选择 2 的值替换为 0,计算出来的各国平均信任值反映了选择信任他人的人口比例,如中国的值 0.542 度量了 54.2% 的中国人选择信任他人。关于社会正义信念(对应问卷 E040)的问题是:以下将列举一些事项,需要你以从 1 到 10 的尺度表达你的观点,1 意味着你完全同意左边的陈述,10 意味着你完全同意右边的陈述,如果你的意见处于两者之间,你可以选择任何中间的值。1—在长期,努力工作常常带来更美好的生活;10—努力工作并不常常带来成功,运气和关系更重要。我们对数据进行了调换,即原数据中选择 1 的被赋值为 10,选 10 的被赋值为 1,以此类推,这使更高的数值代表了更强的社会正义信念。关于竞争信念(对应问卷 E039)的问题是:以下将列举一些事项,需要你以从 1 到 10 的尺度表达你的观点,1 意味着你完全同意左边的陈述,10 意味着你完全同意右边的陈述,如果你的意见处于两者之间,你可以选择任何中间的值。1—竞争是好的,它激励人们努力工作并推动新思想的发展;10—竞争是有害的,它给人们带来最坏的结果。我们同样对数据进行了调换使更高的数值代表更强的竞争信念。关于工作—休闲信念(对应问卷 C008)的问题是:在如下的哪个刻度准确地描述了你对工作(包括家务和学校作业)相对于休闲和娱乐的重视程度。1—是休闲使人生更有意义,而不是工作;5—工作使人生更有意义,而不是休闲。可以选择中间数字表达不同程度的意见。我们直接使用了调查的原始数据,更高的数值代表更强的工作信念。表 1 显示了四个主要信念的描述性统计,同时包括基本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收入等级。

由于第一轮调查(1981—1984 年)只涉及少数几个国家的信任数据,所以我们通过所有数据构造各国的平均信念水平时去掉了第一轮的数据,通过第二至第五轮数据生成各国的长期平均信念数据。各变量数据在国家层面的描述性统计参见表 2。图 1—图 4 则使用这一数据绘制了四种信念与 1991—2012 年平均人均 GDP 增长率的关系。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表 1 全球价值观调查主要信念及人口统计学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Observations	mean	sd	min	max
信任	237 083	0.265	0.4415	0	1
社会正义信念	167 700	6.688	2.902	1	10
竞争信念	203 976	7.428	2.531	1	10
工作—休闲信念	126 776	3.675	1.224	1	5
性别(1—男;0—女)	257 597	0.476	0.499	0	1
年龄	246 747	40.318	15.908	15	99
最高教育(1—最低,8—最高)	230 283	4.408	2.335	1	8
收入等级(1 最低,11 最高)	220 307	4.505	2.385	1	10

注:本研究中涉及的指标个体样本量差距较大,主要是由于全球价值观调查的时间和区域差异,如信任信念在全部 5 轮都有调查,而工作—休闲信念只在后 3 轮进行了调查,同一轮次内有的题目在一些国家进行了调查而在另一些国家却没有,详细的调查覆盖见全球价值观调查的说明文件"WVS 1981-2008 INTEGRATED QUESTIONNAIRE Version: v2011-06-09"。

表 2 全球价值观调查主要信念国家平均水平的描述性统计

信念变量	国家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信任信念	86	0.254	0.138	0.038	0.695
竞争信念	82	7.406	0.561	5.973	8.560
工作休闲信念	67	3.616	0.545	1.624	4.641
社会正义信念	75	6.620	0.835	4.962	8.6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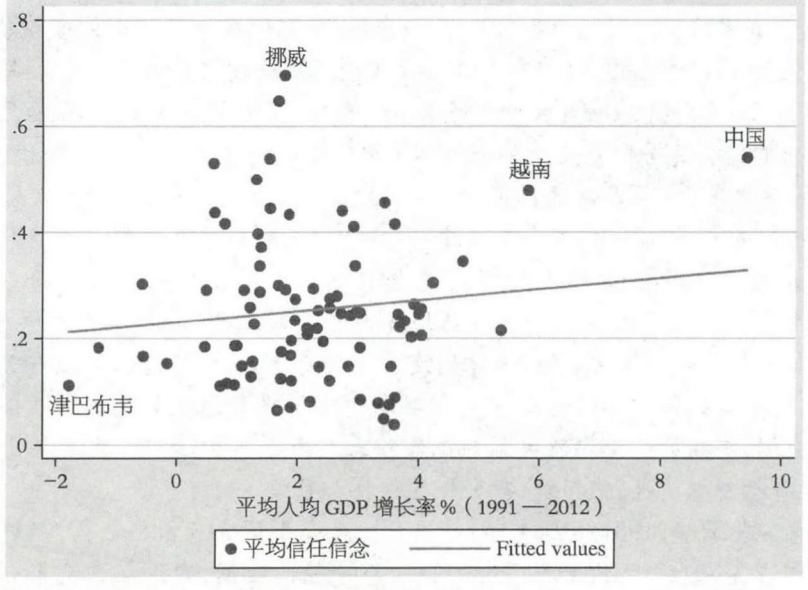

图 1 信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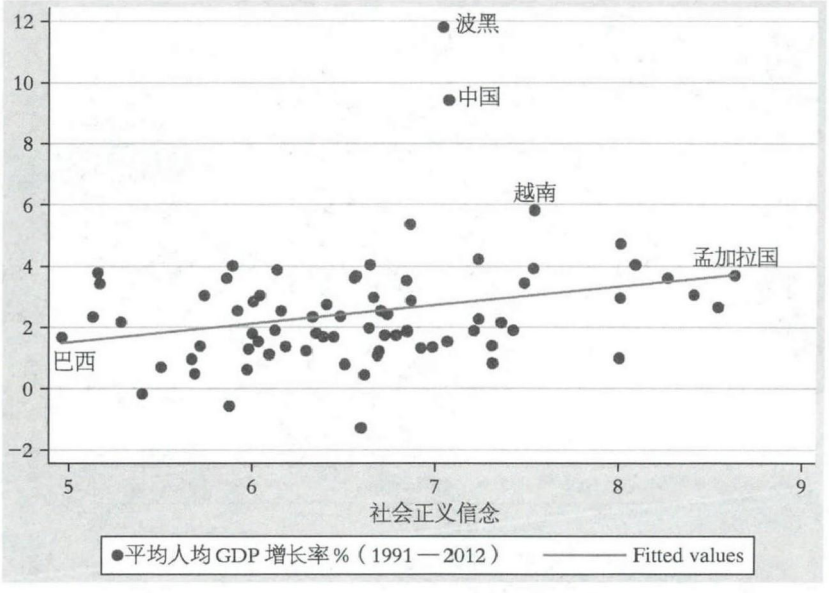

图 2　社会正义信念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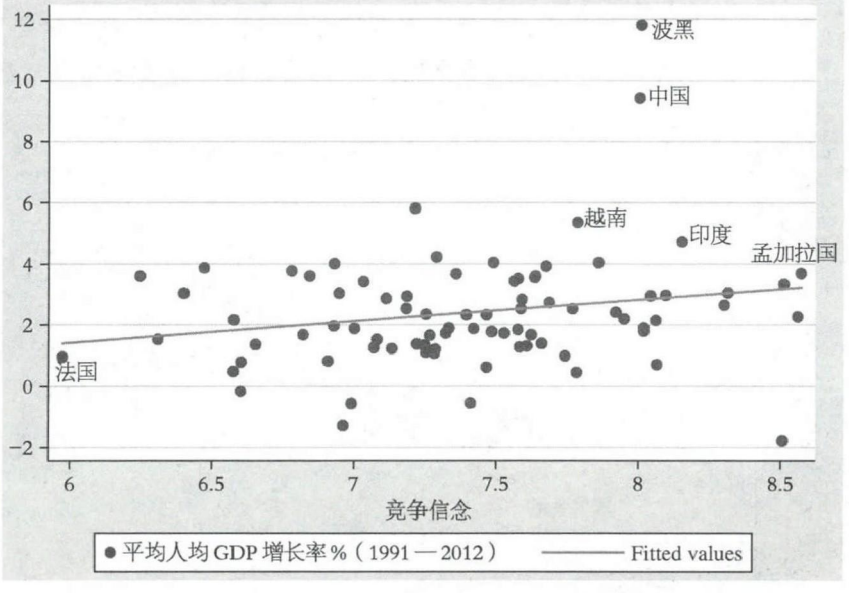

图 3　竞争信念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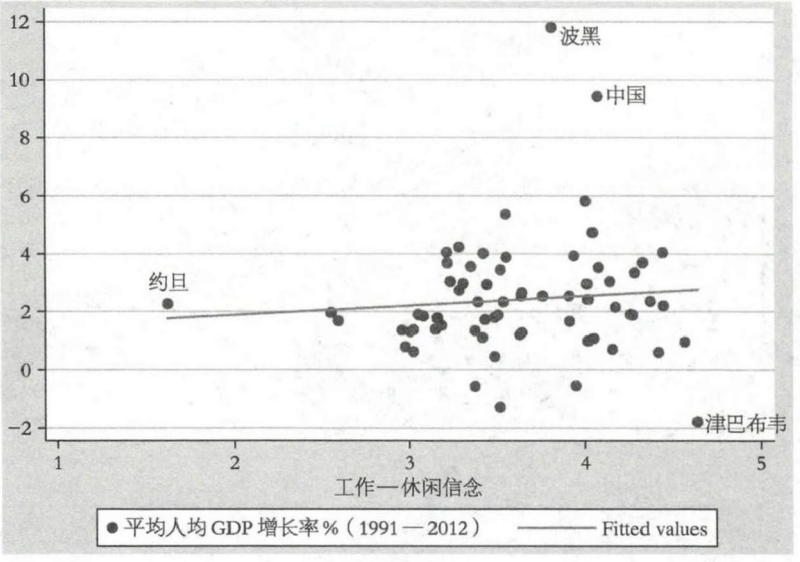

图 4　工作—休闲信念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以下的分析中，我们使用由四种主要信念所构造的综合信念健康度指数作为一个国家信念好坏的综合度量。从图 1 至图 4 可以看出，这四种信念对应的数字越高都不同程度地有利于经济增长。由于四种信念是采用同一次的调查获得，也没有理论支持可以在不同信念中区分出孰轻孰重，我们给予四种信念同等的权重，并且对四种信念数据采取了先标准化处理再加总的方式得到综合信念健康度指数①。综合信念健康度指数与长期平均人均GDP增长率的关系如图5所示，可以看出两者长期的正向关系，尤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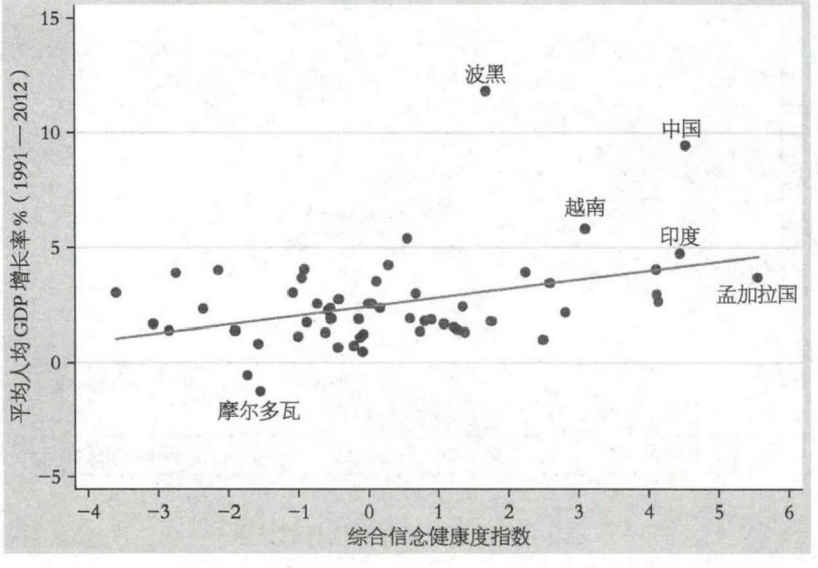

图 5　综合信念健康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① 对信念调查数据加总得到综合指标的方式如 Alesina and Giuliano(2010)对家庭观念的研究。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国、越南、印度等高增长国家同样具有极高的信念健康度①。

四、信念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为了全面探察信念与经济的关系,在用国别数据分析信念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之前,本部分先使用全球价值观调查的数据从个体的角度分析信念与收入的关系。全球价值观不仅包括个体的主观信念数据,还要求受访者报告其收入情况。我们根据各个国家的不同情况将收入划分为 11 个等级,1 代表收入为最低等级,11 代表收入为最高等级,并且分别就四种主要信念以及综合的信念健康度指数对个体的收入情况进行回归,为了结论的稳健性,同时使用 OLS 和有序 Probit 两种方法,并固定了国家效应和调查的轮次效应(加入虚拟变量)。该实证分析中被解释变量为个人的收入等级(Income),解释变量包括信任信念(Trust)、社会正义信念(Social_justice)、竞争信念(Competition)、工作—休闲信念(Work_leisure)、综合信念健康度指数(Belief)、性别(Sex)、年龄(Age)及其平方项(Age2)、教育程度(Edu),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3。

在控制了国家固定效应的情况下,我们发现男性的收入显著高于女性,年龄的回归系数为正,而年龄平方项为负,说明收入随年龄呈倒 U 型,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显著提高收入水平,这与一般理论和研究结论一致。信任、社会正义信念、竞争信念的回归系数都为正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这些信念与个人收入显著正相关。工作—休闲信念的回归系数为显著的负数,这似乎与我们的理论不符合,有两方面的原因可能导致了这一结果:一是在个体的层面收入高的人比收入低的人拥有更多休闲空间,而收入低的人只能花费大量的时间工作;二是由于四种信念来自同一个体一次报告的结果,可能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而导致工作信念的回归系数被部分抵消,而在国家的层面这两种效应都会相应消失。该实证分析结果同时显示综合的信念健康度指数在两种回归中都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其对个人收入的提高具有正向效应。

以上微观层面的分析表明在个体层面上信念与个人在所处国家收入等级之间显著相关,证实了信念的重要经济意义。接着,我们继续考察群体的信念水平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由于信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渠道与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存在明显不同,所以该领域的文献中几乎都没有在经典增长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扩展,而是直接考察信念对增长的作用渠道。另外,虽然如一国的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民族多样性、国家成立年限、人口等因素都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绩效,但由于样本量小且对本研究意义不大,Barro and McCleary(2003)及 Algan and Cahu(2010)等研究价值观与经济增长的文献也采取了不考虑这些变量的方式,所以,本研究也没有在经典增长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扩展讨论而采取较少的控制变量来考察信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① 由于采取平均计算方法,波黑在图中显示了最高的平均人均 GDP 增长率,世界银行数据中 1996 年的波黑增长率接近 90%,在其后大部分年份的增长率落后于中国,最近的几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如果剔除波黑,中国同时具有最高的增长率和极高综合信念健康度。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表 3 信念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Income				
解释变量	1(OLS)	2(OLS)	3(有序 Probit)	4(有序 Probit)
Belief		0.027***		0.012***
		(0.005)		(0.002)
Trust	0.129***		0.060***	
	(0.022)		(0.011)	
Social_justice	0.010***		0.005***	
	(0.003)		(0.002)	
Competition	0.047***		0.022***	
	(0.004)		(0.002)	
Work_leisure	-0.102***		-0.049***	
	(0.009)		(0.004)	
Sex	0.189***	0.199***	0.092***	-0.096***
	(0.019)	(0.019)	(0.009)	(0.009)
Age	0.066***	0.065***	0.032***	0.031***
	(0.003)	(0.003)	(0.002)	(0.002)
Age^2	-0.001***	-0.001***	-0.0004***	-0.0004***
	(0.000)	(0.000)	(0.000)	(0.00002)
Edu	0.343***	0.350***	0.165***	0.168***
	(0.005)	(0.005)	(0.002)	(0.002)
_Cons	2.827***	2.181***		
	(0.111)	(0.092)		
No.	52 433	52 433	52 433	52 433
R^2	0.299	0.295	0.080	0.079

注:在回归中控制了国家固定效应和调查的轮次效应,但限于篇幅,以上表格只报告了主要变量的结果,括号中报告的为稳健标准差。*** 表示在 1% 的水平显著,** 表示在 5% 的水平显著。有序 Probit 报告的 R^2 为伪 R^2。

具体而言,首先,使用长期均值数据进行分析,信念数据使用第二轮至第五轮全球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在各个国家的平均值,共得到 86 个样本。其次,被解释变量为各国 1991—2012 年的平均人均 GDP 增长率(Growth_Rate),解释变量为综合的信念健康度指数(Belief)。平均人均 GDP 增长率与四种信念的相关性见表 4,这显示人均 GDP 增长率与四种信念都呈正相关关系,也支持了使用综合指数的合理性。再次,控制变量的选取,根据以往的文献如 Barro and McCleary(2003)等,我们使用了 1990 年的人均 GDP(GDP1990)作为经济的起始点水平,使用 1991—2012 年平均的总资本形成率(Capital)作为物质资本投入的度量,使用 1991—2012 年平均的中等教育入学率(Sec_Edu)作为人力资本投入的度量,在回归中对以上控制变量进行了自然对数处理。回归结果如表 5 中方程 1 和方程 2 所示。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表 4　人均 GDP 增长率与四种主要信念的相关性分析

	Growth_Rate	Trust	Socail_justice	Competition	Work_leisure
Growth_Rate	1				
Trust	0.0771	1			
Socail_justice	0.2846	0.1155	1		
Competition	0.254	0.0253	0.5113	1	
Work_leisure	0.2488	-0.446	0.2183	0.0845	1

表 5　信念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

Dependent variable: Growth_Rate				
Independent variables	1 （长期均值 OLS）	2 （长期均值 OLS）	3 （面板固定效应）	4 （面板混合回归）
Belief		0.313 ** (0.148)		0.231 * (0.121)
logGDP1990	-0.630 ** (0.275)	-0.921 ** (0.433)	-1.364 *** (0.299)	-1.427 *** (0.307)
logCapital	3.098 ** (1.208)	1.683 (1.451)	4.482 *** (1.531)	5.035 *** (1.441)
logSec_Edu	0.727 (0.674)	2.823 (2.316)	2.417 *** (0.819)	5.726 *** (1.282)
_cons	-5.500 (3.734)	-8.068 * (7.078)	-10.672 ** (4.903)	-26.084 *** (5.994)
No.	82	56	345	48
R^2	0.288	0.393	0.105	0.529
Prob > F	0.000	0.000	0.000	0.000

注：方程 1 和方程 2 为使用长期均值数据的回归，方程 3 和 4 为使用面板数据的回归，其中方程 3 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回归，方程 4 为混合回归，并且是以国家为聚类变量的聚类稳健标准差回归。方程 3 报告的拟合优度为总体 R^2。*** 表示在 1% 的水平显著，** 表示在 5% 的水平显著，* 表示在 10% 的水平显著。分析使用的信念数据来自全球价值观调查，经济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网站，并使用 IMF 的数据和 Mundi 数据库对部分国家缺失数据进行了填补，部分年份人均 GDP 数据和中等教育入学率数据缺失使用相近年份的数据进行了替代。回归 4 中由于信念数据与经济数据的匹配导致样本减少到 48 个。

从方程 1 和方程 2 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初始经济水平、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情况下，综合信念健康度指数度量的国家平均信念对长期的人均收入增长具有显著影响（5% 显著水平），这证实了信念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起始人均收入水平（1990 年）对后期经济增长的效应在方程 1 和方程 2 中显著为负，这与发达国家在过去 20 多年中较差的增长绩效相符。资本形成率和中等教育入学率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都是正的，但中等教育入学率的影响不显著，资本形成率在方程 2 中也不显著。鉴于以上分析考察的是二十多年的平均情况，很可能从物质资本到人力资本的情况在其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另外，以上的分析较难以界定信念和增长的因果关系。

为了使结论更加稳健，我们也对数据进行进一步处理。按照全球价值观调查的轮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次,将数据分为5个阶段,根据全球价值观调查时间段1981—1985年,1989—1994年,1994—1999年,1999—2004年和2005—2007年,选取时间段为1985—1990年,1991—1996年,1997—2002年,2003—2007年,2008—2012年的平均人均GDP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包括与人均GDP同时间段的平均总资本形成率,以及相应1984年、1990年、1996年、2002年和2007年的人均GDP水平以及中等教育入学率。这样的变量选取使得经济增长率的时间段计算普遍滞后于信念调查获得的时间,并且其他控制变量对增长的作用更为直接。回归结果如表5中方程3和方程4所示。在方程3和方程4中传统的变量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对增长有促进作用,初始人均GDP水平对增长的作用为负,这与方程1和方程2的结论是一致的。我们关注的核心变量——综合信念健康度指数同样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五、信念与经济增长:进一步的探讨

以上的分析虽然表明信念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但是,并没有充分理由表明究竟是信念带来增长的差异,还是增长本身改变了信念。我们在上一部分使用滞后信念调查的增长率做被解释变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即高的信念健康度伴随之后一定时期经济的高增长。在文献中通常通过寻找工具变量的方法来解决内生性问题,如Algan and Cahuc(2010)使用二代移民的信念代理原国民的信念。由于本研究较为创新地针对综合信念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考察,思想意义更为重要,并且我们认为在理论上存在两者互为因果的关系,所以并不试图选择其他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而更有意义的问题是,信念本身与经济增长具有怎样的运动规律,群体的信念是如何发生重大变化的,进而为解释经济增长的国别差异和跨时差异提供依据。

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放缓现象引起了经济学家极大的探索兴趣(Maddison,1987),但是,尚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原本勤劳的民族会在走上富裕之后变得懒散,对社会财富和地位的追求变得弱化,整个竞争与工作的信念都会发生极大的变化。从理论上来看,人们关于社会竞争的信念可能会随社会财富的增长发生变化,在资源较为紧张的情况下,当生存尚面临挑战时更可能会激发出人们的竞争意识。相反,当社会财富增长到一定程度,基本的生活不再面临困难时人们的竞争意识可能会随之减弱,这可能有助于解释经济增长中极为重要的增长收敛问题。

我们以1990年人均GDP收入5 000美元将全球价值观调查覆盖的国家分为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两部分(82个国家中高收入国家占25个),并对两组国家的平均竞争信念进行比较,可以发现高收入国家的平均竞争信念显著低于低收入国家(Wilcox-on-Mann-Whitney检验的p值为0.0283,以6 000美元为界的检验为0.0106),但是我们进一步地将1991—2012年的平均人均GDP增长率以3%为界分为高低增长率国家(82个国家中高增长国家占25个)的分析表明,高增长国家的平均经济信念平均高于低增长率国家,但并不显著(p值为0.5969)。

与竞争信念类似,随着财富的增长,富裕国家的人们更倾向于休闲,而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有更强的工作信念,以1990年人均GDP收入5 000美元将全球价值观调查覆盖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国家分为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两部分(67 个国家中高收入国家占 19 个),并对两组国家的平均工作—休闲争信念进行比较,可以发现高收入的平均工作信念显著低于低收入国家(Wilcoxon-Mann-Whitney 检验的 p 值为 0.0000),但是我们进一步地将 1991—2012 年的平均人均 GDP 增长率以 3% 为界分为高低增长率国家(67 个国家中高增长国家占 19 个)的分析表明,高增长国家的平均工作信念平均高于低增长率国家,但并不显著(p 值为 0.1863),这与竞争信念的结论一致。

表 6　经济因素对信念的影响分析

	Trust		Social_justice		Competition		Work_leisure	
GDP1990	0.035***		-0.192***		-0.137***		-0.222***	
	(0.012)		(0.058)		(0.040)		(0.027)	
Growth_Rate		0.006		0.119***		0.061**		0.023
		(0.008)		(0.041)		(0.028)		(0.033)
No.	86	86	75	75	82	82	67	67
R^2	0.1433	0.0071	0.1119	0.0722	0.1315	0.0428	0.3300	0.0076

为了更严谨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分别以四种主要的信念为被解释变量,并分别以 1990 年的人均 GDP 水平(GDP1990)和长期平均的人均 GDP 增长率(Growth_Rate)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可以发现 1990 年起始的人均收入水平对信任具有正向影响,但是对其他三种信念的影响都为负,尤其对工作—休闲信念的影响最大。GDP 增长率对所有信念的影响都是正向的,对社会正义信念和竞争信念的影响显著,对其他两种信念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收入的提高确实可以改变人们的信念,而信念又对经济绩效产生影响。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和越南因为经济起点较低,民众对追求财富与成功有强烈的渴望,这种健康的经济信念为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起了重要作用。而发达国家民众可能会更重视休闲和社会福利,导致经济增长缺乏足够的激励,增长必然放缓。

虽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仍然有许多发展中国家陷于贫困的陷阱,以上的解释不足以代表全部。为此,我们认为重大的社会变革会深远地改变人们的信念。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东欧剧变是近几十年来世界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之一,理论上可以预期这次变革会对人们的主要经济信念产生影响,特别是原来处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选取了代表性的几个国家考察其群体信念在一定时期后是否发生显著的变化。全球价值观调查的第二轮刚好正值东欧剧变之际,以此作为比较的基础,我们使用 Wilcoxon-Mann-Whitney 秩检验特定国家不同轮次的数据是否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结果见表 7。

可以看出从第二轮调查到第三轮调查,俄罗斯和一些东欧国家所考察的信念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表 7 中可以看到大部分原受前苏联影响的国家有明显的信念变迁。该时间段(第二轮调查到第三轮调查),中国人的信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不禁可以联系到 1992 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所带来的思想冲击。但是,从第三轮调查到第四轮调查中国的群体信念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表7 信念差异的统计检验

国家(轮次R)	信任信念	社会正义信念	竞争信念	工作信念
中国(R2 Vs. R3)	3.889 (0.000)	11.783 (0.000)	-2.402 (0.016)	-
中国(R3 Vs. R4)	-1.059 (0.290)	-	1.718 (0.086)	-1.079 (0.281)
俄罗斯(R2 Vs. R3)	9.046 (0.000)	-5.612 (0.000)	-8.120 (0.000)	-
俄罗斯(R3 Vs. R5)	-2.002 (0.045)	-11.301 (0.000)	-0.614 (0.539)	-
捷克(R2 Vs. R3)	0.840 (0.401)	-8.859 (0.000)	-13.166 (0.000)	-
波兰(R2 Vs. R3)	8.358 (0.000)	-0.067 (0.947)	-10.918 (0.000)	-
波兰(R3 Vs. R5)	-0.909 (0.363)	-0.923 (0.356)	-3.373 (0.001)	-
斯洛伐克(R2 Vs. R3)	-1.650 (0.099)	-3.980 (0.0009)	-5.173 (0.00009)	-

注:表中报告的为 Wilcoxon-Mann-Whitney 检验的 z 值,括号中为相应的 p 值。

六、结论与展望

在社会科学界一个日益广泛的共识是,决定当今社会发展的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整个社会群体的信念,这些信念或价值观通过各种机制转化为行为乃至动力来推动之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本文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和文化经济学的基础上突出强调信念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我们认为,各个国家或地区民众所持群体信念的差异是导致不同社会制度体系,进而经济绩效差异的重要原因。本文在研究中不可多得地将信念这一相对主观的因素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进行理论论证和实证检验。我们发现,国家层面的信任、社会正义信念、竞争信念以及工作—休闲信念水平与国家的长期增长速度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以四种信念构造的综合信念健康度指数可以显著解释国家的经济绩效差异。

这一分析思路可以部分弥补目前的增长理论所遇到的困难,如 Acemoglu *et al.* (2005)对朝鲜和韩国的增长差异解释中认为两国本来具有共同的文化基础,以分裂为标志的自然实验充分证明了制度的根本作用,但是其分析仍然存在不能解释制度的差异又是怎么来的问题。如果考虑信念的作用,可以认为虽然两国本来具有共同的文化,但是由于不同外部力量的介入使两国的群体信念产生了差异,进而才导致经济增长绩效的差异。另外,中国的综合信念健康度指数在82个样本国家中位列第二,同时越南、印度等高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也都表现了较高的综合信念健康度。这有助于说明中国增长奇迹背后真正的故事,中国人民的勤劳智慧和积极上进的价值观念为主体的"中国梦"才是中国不断进步的不竭动力。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参 考 文 献

Acemoglu, D., S. Johnson and J. A. Robinson,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3):1369-1401.

Acemoglu, D., S. Johnson and J. A. Robinson, 2002, "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m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4):1231-1294.

Acemoglu, D., S. Johnson and J. A. Robinson, 2005, "Institutions as a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Run Growth,"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Vol. 1, Part A:385-472.

Aghion, P. and P. W. Howitt,1992,"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 *Econometrica*, 60(2):323-351.

Alesina, A. and E. L. Glaeser, 2004, *Fighting Poverty in the US and Europe: A World of Differ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lesina, A., G. Cozzi and N. Mantovan, 2012,"The Evolution of Ideology, Fairness, and Redistribution," *The Economic Journal*, 122(565):1244-1261.

Alesina, A. F., E. L. Glaeser and B. Sacerdote, 2006,"Work and Leisure in the US and Europe: Why so Different?" In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2005, Volume 20 (pp. 1-100), MIT Press .

Alesina, A. and Nicola Fuchs-Schündeln, 2007, "Good Bye Lenin (or not?): The Effect of Communism on People's Preferenc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7(4):1507-1528.

Alesina, A., E. L. Glaeser and B. Sacerdote,2001, "Why Doesn't the United States Have a European-Style Welfare State?"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187-254.

Alesina, A. and G. M. Angeletos, 2005, "Fairness and Redistribu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4):960-980.

Algan, Y. and P. Cahuc, 2010, "Inherited Trust and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0(5):2060-2092.

Aoki, M., 2011, "Institutions as Cognitive Media between Strategic Interactions and Individual Belief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79(1-2):20-34.

Arrow, K. J., 1972, "Gifts and Exchange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1(4):343-362.

Axelrod, R. M., 1984,*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Azariadis, C., B. L. Chen, C. H. Lu and Y. C. Wang,2013, "A Two-Sector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with Leisure Externalitie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48(2):843-857.

Barro, R. J. and R. McCleary,2003, "Religion and Economic Growth,"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s, No. w9682.

Benhabib, J. and R. Perli,1994, "Uniqueness and Indeterminacy: On the Dynamics of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63(1):113-142.

Benabou, R. and E. A. Ok, 2001,"Social Mobility and the Demand for Redistribution: The POUM Hypothesi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6(2):447-487.

Bénabou, R. and J. Tirole,2006,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Redistributive Politic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1(2):699-746.

Bisin, A. and T. Verdier,2001, "The Economics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the Dynamics of Prefer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97(2):298-319.

Bisin, A., G. Topa and T. Verdier, 2004, "Cooperation as a Transmitted cultural Trait,"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16(4):477-507.

Cass, D., 1965, "Optimum Growth in an Aggregate Model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32(3):233-240.

Charness, G., D. Masclet and M. C. Villeval,2010,"Competitive Preferences and Status as an Incentive: Experimental Evidence," Groupe d'Analyse et de Théorie Économique Working Papers, No. 1016.

Coleman, J.,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Supplement):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S95-S120.

Coates, J. M., M. Gurnell and A. Rustichini, 2009, "Second-to-Fourth Digit Ratio Predict Success among High-Frequency Financial Trader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6(2): 623-628.

Denzau, A. and D. North, 1994, "Shared Mental Models: Ideologies and Institutions," *Kyklos*, 47(1):3-31.

Duman, A., 2013, "Beliefs, Economic Volatility, and Redistributive Preferences across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51(2):203-218.

Di Tella, R., S. Galiani and E. Schargrodsky, 2007, "The Formation of Beliefs: Evidence from the Allocation of Land Titles to Squatter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2 (1):209-241.

Di Tella, R., S. Galiani and E. Schargrodsky, 2012, "Reality versus Propaganda in the Formation of Beliefs about Privatiza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6(5): 553-567.

Di Tella, R. and J. Dubra, 2008,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the 'American Dream',"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2 (7):1564-1584.

Furnham, A., B. D. Kirkcaldy and R. Lynn, 1994, "National Attitudes to Competitiveness, Money, and Work among Young People: First, Second, and Third World Differences," *Human Relations*, 47(1):119-132.

Granato, J., R. Inglehart and D. Leblang, 1996, "The Effect of Cultural Value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Hypotheses, and Some Empirical Test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0(3):607-631.

Greif, A., 1994, "Cultural Belief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A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Collectivist and Individualist Socie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2(5):912-950.

Greif, A.,1993, "Contract Enforceability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in Early Trade: The Maghribi Traders' Coali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3(3):525-548.

Guiso, L., P. Sapienza and L. Zingales,2006, "Does Culture Affect Economic Outcom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2):23-48.

Guiso, L., P. Sapienza and L. Zingales,2008, "Alfred Marshall Lecture: Social Capital as Good Cultur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6(2-3):295-320.

Gambetta, D.,2000, "Can We Trust Trust?" in Gambetta, Diego(ed.) *Trust: 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 electronic edi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Oxford, 13,213-227.

Glaeser, E. L. and A. Shleifer, 2002, "Legal Origi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4):1193-1229.

Glaeser, E. L., R. La Porta, F. Lopez-de-Silanes and A. Shleifer,2004, "Do Institutions Cause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9(3):271-303.

Gómez, M. A., 2008, "Consumption and Leisure Externalities, Economic Growth and Equilibrium Efficiency,"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5(2):227-249.

Grossman, G. M. and E. Helpman,1991, "Quality Ladders in the Theory of Growth,"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58 (1):43-61.

Hall, R. E. and C. I. Jones, 1999, "Why do Some Countries Produce so Much More Output per Worker than Other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14(1):83-116.

Hirschman, A. O. and M. Rothschild,1973, "The Changing Tolerance for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Cour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A Mathematical Appendix,"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87(4):544-566.

Hirshleifer, J., 1978, "Competit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Economics and Biolog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8 (2):238-243.

Honekopp, J., J. T Manning and C. Muller,2006, "Digit Ratio (2D:4D) and Physical Fitness in Males and Females: Evidence for Effects of Prenatal Androgens on Sexually Selected Traits," *Hormones and Behavior*, 49(4):545-549.

Knack, S. and P. Keefer,1997, "Does Social Capital Have an Economic Payoff? 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4):1251-88.

Koopmans, T. C.,1965, "On the Concept of Optimal Economic Growth," in *Economic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Planning*, Amsterdam: North-Holland.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Landes, D. S.,1999,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 New York: Norton.

La Porta, R., F. Lopez-de-Silanes and A. Shleifer,2008,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Legal Origin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46(2):285-332.

La Porta, R., F. Lopez-de-Silanes, A. Shleifer and R. Vishny, 1997, "Trust in Large Organiz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7(2):333-38.

Ladrón-de-Guevara, A., S. Ortigueira and M. S. Santos,1999, "A Two-Sector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with Leisure,"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6(3):609-631.

Leibbrandt, A., U. Gneezy and J. A. List, 2013, "Rise and Fall of Competitiveness in Individualistic and Collectivistic Societies,"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10(20):9305-9308.

Lerner, M. J., 1982,*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 Fundamental Delusion*, New York: Plenum Press.

Lucas, R.,1988,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1):3-42.

Maddison, A.,1987, "Growth and Slowdown in Advanced Capitalist Economies: Techniques of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5(2):649-698.

Manning, J. T. and R. P. Taylor, 2001,"Second to Fourth Digit Ratio and Male Ability in Sport: Implications for Sexual Selection in Humans,"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2(1):61-69.

Piketty, T., 1995, "Social Mobility and Redistributive Politic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0(3):551-584.

Piketty, T., 1998, "Self-Fulfilling Beliefs about Social Statu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70(1):115-132.

Prescott, E. C.,2004, "Why Do Americans Work So Much More than European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Quarterly Review*, 28(1):2-13.

Putnam, R. D., 2000,*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Romer, P. M.,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5):1002-1037.

Romer, P. M., 1990,"Endogenous Techn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5):71-102.

Rotemberg, J., 2002, "Perceptions of Equit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2): 249-288.

Sapienza, P., A. Toldra-Simats and L. Zingales, 2013, "Understanding Trust," *The Economic Journal*, 123(573):1313-1332.

Sachs, J. D., 2003,"Institutions Don't Rule: Direct Effects of Geography on Per Capita Incom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s, No. w9490.

Smith, A., 1776,*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Solow, R. M., 1956,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0(1):65-94.

Suhrcke, M.,2001,"Preferences for Inequality: East versus West," Innocenti Working Paper, No. 89, UNICEF, Florence.

Tabellini, G., 2008, "The Scope of Cooperation: Values and Incentiv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3(3): 905-950.

Tabellini, G., 2010,"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s of Europ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8(4):677-716.

Weber, M., 1930,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